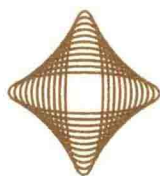


『创造性介入』概说

仁智大国



中国外交新取向
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中国外交的转型

“创造性介入”三部曲

A Wise and
Benevolent Power

Creative Involvement
in a Nutshell

王逸舟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逸舟——著

仁智大国

『创造性介入』概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王逸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301-29524-3

I. ①仁… II. ①王… III. ①外交—研究—中国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3161 号

- 书 名 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
RENZHI DAGUO: “CHUANGZAOXING JIERU” GAISHUO
- 著作责任者 王逸舟 著
- 责任编辑 耿协峰 孙莹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524-3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微信公众号 ss_book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247 千字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6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创造性介入”三部曲

A Wise and Benevolent Power

Creative Involvement
in a Nutshell

目 录

引 语 / 1

第一部分 基本线索 / 4

一、外交本质 / 5

二、研究线索 / 7

三、创造性介入 / 11

四、场景推演 / 17

五、外交转型 / 33

六、全球趋势 / 40

七、理论支撑 / 64

第二部分 代际转换 / 106

一、毛泽东时代：屈辱催生的抗争立场 / 107

二、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 / 117

三、新一代外交：世界大国的机遇与考验 / 129

四、外交转型的社会基础 / 151

第三部分 能力建设 / 164

一、外交公共产品问题：以对非外交为例 / 165

二、欧洲人如何扮演全球角色？——借鉴与反思 / 214

三、中国外交能力：新的方位及议题 / 243

结语 仁的社会，智的外交 / 312

后 记 / 325

引 语

本书的主题，是探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取向，即笔者提出的“创造性介入”，一种仁智大国的定位。

这一外交与过去相比，有哪些独特的机遇，又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为什么“仁”与“智”——而非简单的权术和力量——是中国大国新型外交特别需要的品格？

与此相关需要探讨：这种新外交取向——中国作为行为主体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的积极态度——与当代世界复杂多变的格局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怎样辨识逆全球化潮流与人类进步演化的总体趋势，使我们国家未来能趋利避害、持续前行？

继续追问：与国内外各方面需求对照，现有外交体制机制还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创造性介入的过程如何不靠蛮力、不拼体量规模、不过多依赖金钱和物力，而是通过智慧的方案、有效的斡旋、富有想象力的安排，以“仁”“智”的格调推进？

它还涉及外交的国内基础和政治条件。中国从相当落后发展进入比较先进的阶段，尽管民族国家建设取得世人公认的成就，但并不完备和充分；尤其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存在诸多缺失和障碍，外交的能力建设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这方面的氛围与条件。因此，社会政治转型问题也应当成为外交研究的重要内容。

简言之，本书提倡的“创造性介入”，不应当只是被视为倡导积极进取、角色活跃的对外态度，同时要求对自身长短有清醒的估计，努力成为有风范的、进步的、被本国人民热爱并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家。

期待我们的国家朝着仁智大国的方向不断迈进。

第一部分

基本线索

基本线索

一、外交本质

在分析中国外交之前，先说说一般性的概念：什么是“外交”？

看似不成问题的这个问题，其实需要探讨一下，因为现在常常把它和别的东西搞混。

政府的外交、军事、商务三个主要部门，构成国家对外交往的三大支柱。它们互相支持，也有内在联系，但彼此的方向和功能有大的区分。笔者认为，外交最重要的内涵，是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外交的主题词应该是“斡旋”（mediation），即通过智慧的方式（通常是非武力的、非强制的形态）化解争端，至少是缓和危局。这使得它与军事（以武力或武力威慑实现安全和大的战略目标）和商务（主要依靠市场、货币和资源获取经济收益）的功能区别开来，后两者对应的主题词分别是“威慑”（deterrence）和“逐利”（profit）。

当然，这仅是比较简单的说法。细究起来，外交工作其实还有许多不同的任务，它们均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比如，使领馆收集和梳理当事国的各种信息，为国家高层有关决策提供不可或缺的依据；外交部须统筹协调本国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为国内各部门加入多边机构确定总体目标；不管一般人感受如何、成效显著与否，外交人员承担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国际谈判和调解工

作（通常在官方照会和最终缔约之前），他们的工作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外沟通的正式而权威的渠道。广义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进行外交活动、表达本国诉求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也可以说，外交是主权国家存在的象征，是各种国际活动的中心部分。

“外交”范畴的讨论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一般而言，狭义的“外交”（diplomacy），指的是外交部门代表国家对外行使职责的方式及内容，如建交或断交、照会或派遣特使、宣布领导人的出访来访、安排国家间的谈判和交涉、参加只有主权国家能够参加的国际会议，等等；它表达的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和要求，只有职业外交人员才能执行其使命任务（对其专业外语、法律知识和组织纪律通常都有严格要求），也自然构成所谓“总体外交”或“大外交”的核心部分。“外交”有时也有广义的解释，而且现在各国都有更多使用广义“外交”的趋势；这种解释所讲的“外交”（英语有多种译法，如“foreign affairs”“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eign relations”等），具有“对外关系”“涉外事务”“国际联系”的含义，在适当加上传统狭义外交的某些职能与性质之后，它们构成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广义范畴。这方面之所以有越来越多应用的势头，是因为广义的外交概念有利于国家在不同层面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尤其当核心外交遇到障碍、无法沟通时，典型提法有“体育外交”“教育外交”“文化外交”“商务外交”“军事外交”“人民外交”“公众外交”“公共外交”“非中央外交”“次区域外交”等。笔者比较赞成“大外交”或“总体外交”的做法及提法，研究工作保持开放包容性，既有对核心外交层次的透视，主要涉及外交、商务、军事三大部门近年的案例，着眼外交部门的办案思路与技巧，分析职业外交官主导的“创造性介入”，提示外交的新取向，也有宽泛的讨论，即针对社会政治层面影响外交的因素做出探讨，把国际关系与国内变迁挂钩，把对外的工作与内部的改革相结合。

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会仔细讨论上述所有方面，此处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外交职能多种多样，但外交的第一要务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争取和平，是利用互谅互让、合作共赢的途径最大限度地实现或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是在坚守原则和核心要求的前提下展现充分的灵活性、高度的可塑性。与军人的典型形象（孔武有力、严肃刚毅）和商人的通常追求（看重市场份额和利润回报）不同，“外交脸”应该是微笑式的，“外交人”就意味着有柔软的身段，有严谨却不失魅力的表述方式，有再困难也愿意探究回旋可能性的职业精神。简言之，外交是一种复杂的艺术，能够表现想象力与包容性。成熟的外交是先进民族特性的组成部分，是国内体制机制的一种对外折射。

把握住这个点，有利于我们理解后面对中国新外交的讨论。

二、研究线索

在经历了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中国外交已跃上一个新的高地。“新高地”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显著特征：其一，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差不多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表态，在某些领域（如推进世界贸易和投资、大范围推广脱贫减灾经验、拉动全球制造业景气等），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良好前景。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也是占当今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罕见的机遇，当然其间包含着中国外交人的辛劳。其二，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大量批评与建议，所谓“高处不胜寒”，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症，例如各个层次的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和大众舆论，已出台的某

些政策缺乏公信力，外交部门的自我评估与外界评价之间有差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外交急需自我更新和再定位，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

笔者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是就新时期、新高地的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建言。它并非某种系统的思想学说或逻辑假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①，而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象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这种“创造性介入”论说，主要受到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些成功案例的启示，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风格的延续性，参照了国际惯例及发展趋势，努力发掘国际外交事务圈的“中国特色”。大体上，“创造性介入”的要旨如下。

(1) 它判定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我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

^① 对于中国外交过去一段时期的实践成效，国内外学界和研究者有大相径庭的评估及结论。下面的作品可作为有代表性的、相对深入和客观公正的读物：Barry Buzan,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Routledge, 2004; [加] 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朱锋、[美] 罗伯特·罗斯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 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总体而言，笔者的个人感受是，它们各有其观测角度和事实依据，阐述的看法都有值得重视的道理，但同时均有缺失和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不足是，就本书关注的主题来说，多数作者似乎不言自明有一个预设，即中国是一个长期有麻烦、存在巨大不稳定性和挑战威胁的国家，中国外交始终处于被动的、反应型的状态，而“国际社会”（其实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总是用同情或责备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中国问题”，或对中国外交“下指导棋”。这个预设固然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不过不是本书批评的重点。笔者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多样的、变化的、可影响的对象？中国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的同时如何展示自己的活力？中外的互动如何放置在一个更有积极意义和创造性的平台上？对这些问题，似乎缺乏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答案。

(2) 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

(3) 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要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

(4) 它特别强调国内社会政治清明开放的价值,把内部的改革和进步作为外交活跃奏效的基石,提示国家外交转型与社会政治转型之间的正比联系。

发生在新世纪前后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实践,预示着中国外交更大作为与责任的时代,揭示出未来中外关系更加积极和良性互动的力量源泉。“创造性介入”当然需要付出大量智慧与心血,似乎让外交人和政治家增添了成本和辛劳;但它也有好的回报,不只是拓展了于我有利的空间,使中国外交家能够扬长避短、大展身手,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外部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富有智慧的一面,对内也将产生持续的“倒逼效应”,促使我们的做法、体制和观念不断改进、去粗取精。

本书的写作思路是,在大致厘定“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之后,挑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梳理呈现其创新之处并解释其普遍意义。案例选取的原则是尽量“厚今薄古”,以便与中国外交的下一阶段对接;素材完全取自可公开查阅的资料,包括网上可查的信息,以表明中国外交研究可以不依赖特殊渠道和内部信息。本书不仅讨论每个个案的成功之处,也要探究它们有待完善的地方、局限性和风险;与其说是赞扬那些优秀的外交官和外交手笔,不如说是更希望鞭策、推动相关的变革及反思。本书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逻辑,介绍有关“创造性介

入”的各种支持性命题、观点和“理论”；第二部分把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外交方针和国际角色做出对比，揭示中国从革命者到建设性大国的全球角色转换，厘定转型命题的大致内涵；第三部分聚焦中国外交能力建设问题，研究若干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领域及问题。囿于笔者有限的信息量和认识力，书里选取的案例，肯定有各式各样的缺失和不同的解说版本。所谓“理论”，也只是笔者个人对中国外交实践过程的一种初步整理，还不是系统和成熟的学说。请读者注意，这种新外交的基本取向不是书里的外交故事细节和精准度，而是“创造性介入”的思路。

这里顺便说一下本书的分析角度。首先，它不属于简单的对策研究，也不算是单纯的描述解释，更不像是有些人热衷的预测分析。在笔者的心目中，研究工作不必把自己束缚在特定框架内，上面提到的三种角度都可以应用，关键在于分析和写作时从实际出发，避免跟风或唯上。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的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长短优劣，我们既不要过分迷信它们，也不要随便否定其功用。就笔者而言，比方说，比较欣赏建构主义对问题的动态捕捉和解析能力，比较看重全球主义，特别是新的全球治理学说的包容性和进步视野，比较不喜欢传统权力政治理论咄咄逼人的争斗特点，比较愿意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探索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同时比较注意那些小而有趣、多少有些跨领域和交叉学科的学术讨论（如“主权”“人权”的讨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非传统安全理论、功能外溢说、复杂性学说等），避免以偏概全，影响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严谨。再次，就“创造性介入”这一范畴的探索路径而言，开始时主要考虑的是对中国外交这些年建设性参与世界事务、发挥更大作用之实践的经验做一些梳理，越往后越觉察到内政对外交的推动（制约）作用，所以不光要赞扬成绩，也要思考缺失，本书后面的部分更多的是审视和批评，也是对中国走向更高阶段的期待。

“内圣外王”的中国古训启迪我们：与其更多算计他人，不如自

省自强。这既是笔者研究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创造性介入”思想的主要线索。

三、创造性介入

在新时期各方面的要求和利益驱动下，在量力而行与统筹兼顾的前提下，中国外交须对国际事务有更大的“创造性介入”。在这里，“介入”一词（involvement 或 intervention^①）比较容易理解，指的是“参与”“加入”“契入”“卷入”或“进到内部”的意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创造性”这个前缀性术语。

所谓“创造性”（creativity），是指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或结果的过程。在心理学的分析里，创造性的心理也是复合思维与发散性思维结合生成的一种形态，它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等特点，并与人的坚持、自信、意志、责任、勤奋、热情、兴趣和联想等能力有关。创造性常常表现为特别具有主动性和进取心的一种思维过程。当我们说某个人具有“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ought）时，是指其思维不仅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还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建设性的设想和意见。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思维相比，其特点是思维方向的求异性、思维结构的灵活性、思维进程的飞跃性、思维效果的整体性和思维表达的新颖性。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为特征的心理活动，需要人们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一项创造性思维成果的取得，往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刻苦的钻研，甚至多次的挫折；创造性思维要经过知识的积累、素

^① 加拿大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埃文斯（Paul Evans）曾向笔者建议“创造性介入”的英文译法。他建议不使用“intervention”而用“involvement”，理由是在英语中，前者稍带贬义而后者较为中立。经过考虑，笔者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此，也向埃文斯教授表示感谢。